

## 書評：《懸崖上的寺院——四川佛教藝術》\*

常青

四川大學

西南巴蜀地區（四川、重慶），在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不僅有早期東漢崖墓上的佛像、東漢三國時期墓葬中出土的銅質搖錢樹上的佛像<sup>1</sup>，成都出土的南朝單體石造像<sup>2</sup>，還有一大批石窟與摩崖造像，更是難能可貴。據近期的考古調查，全中國現存石窟與摩崖造像地點共 6 千左右，而四川、重慶就有 2900 多處，主要雕鑿於唐宋時期，是研究中國佛教藝術不可或缺的資料。對四川、重慶石窟與摩崖造像的研究，中國學者早已關注，在 2000 年以前就已成果斐然<sup>3</sup>。在 21 世紀初，又在調查與著錄方面成績卓著，發表了一大批調查報告與專著。

---

\* 感謝四川大學藝術學院研究助理夏夢萍的幫助！

<sup>1</sup> 宿白《四川錢樹和長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國南方發現的早期佛像札記》，《文物》2004 年第 10 期，第 61-71 頁。

<sup>2</sup> 四川博物院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sup>3</sup> 關於 20 世紀川渝地區唐宋石窟與摩崖造像的研究，參見拙文《二十世紀隋唐佛教考古研究》，《藝術史研究》第 16 輯，2014 年，第 69-96 頁；《二十世紀宋元佛教考古研究》，《藝術史研究》第 18 輯，2017 年，第 355-385 頁。

然而，在西文語境中，對於川渝石窟以及佛教藝術的研究還談不上全面，只有少許研究成果。2004年，Dorothy C. Wong 在其佛教造像碑的專著中研究了四川出土的南朝造像碑<sup>4</sup>。同年，Nicoletta Celli 發文論述了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的一件南朝石造像<sup>5</sup>。一些美歐學者針對某一個地點作了研究與介紹。例如，1995年，Henrik H. Sørensen 發文研究了四川安岳茗山寺的摩崖造像<sup>6</sup>。1989、1998年，Angela F. Howard 和 Henrik H. Sørensen 分別研究了四川蒲江飛仙閣的摩崖造像<sup>7</sup>。2001、2003年，Angela Falco Howard 和 Thomas Suchan 分別概觀研究了大足寶頂山和北山石窟<sup>8</sup>。2007年，Tom Suchan 對大足石門山造像作了研究<sup>9</sup>。2010年，Zhou Zhao 研究了川渝地區的三教合流石窟<sup>10</sup>。2012年，Kim Hunter Gordon 對重慶合川宋代禪宗

<sup>4</sup> Dorothy C. Wong, *Chinese Steles: 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sup>5</sup> Nicoletta Celli, "Considerations on the so-called stele of 425 at Wanfosi (Chengdu, Sichua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2004 (8), pp. 228-210.

<sup>6</sup> Henrik H. Sørensen, "Buddhist Sculptur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at Mingshan Temple in Anyue, Sichuan," *Artibus Asiae*, 1995(3/4), pp. 281-302.

<sup>7</sup> Angela F. Howard, "Buddhist Sculpture of Pujiang, Sichuan: A Mirror of the Direct Link between Southwest China and India in High Tang," *Archives of Asian Art* 42 (1989): 49-61; Henrik H. Sørensen,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at Feixian Pavilion in Pujiang, Sichuan," *Artibus Asiae*, 1998 (1/2), pp. 33-67.

<sup>8</sup> Angela Falco Howard, *Summit of Treasures: Buddhist Cave Art of Dazu, China*, Weatherhill, 2001; Thomas Suchan, *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the Fowan and Related Sites at Beishan, Dazu Ca. 892-1155*,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3.

<sup>9</sup> Tom Suchan, "The Cliff Sculpture of Stone-Gate Mountain: A Mirror of Religious Eclecticism in the Art of Twelfth-Century Sichuan," *Archives of Asian Art* 57 (2007): 51-94.

<sup>10</sup> Zhou Zhao, *The Unified Three Teachings in the Rock Carv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in Chongqing and Sichu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Heidelberg University, 2010.

石窟造像作了研究<sup>11</sup>。2016年，Karil J. Kucera對大足寶頂山石刻從佛教的禮儀與圖像角度作了研究<sup>12</sup>。2021年，Xiao Yang綜合研究了川北的唐代石窟<sup>13</sup>。關於川渝石窟的個案研究，有1991、2016年Henrik H.Sørensen對大足寶頂大佛灣南宋動物圖像的研究<sup>14</sup>，2004年Stephen F. Teiser對四川輪回圖像的研究<sup>15</sup>。

2021年12月，旅美韓裔學者李琛妍(Sonya S. Lee)著《懸崖上的寺院——四川佛教藝術》(*Temples in the Cliffside: Buddhist Art in Sichuan*)一書，由位於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出版，無疑是對國外川渝石窟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貢獻。

李琛妍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東亞宗教藝術與建築，著述頗豐。2010年，她的專著《健在的涅槃：中國視覺文化中的佛之死》(*Surviving Nirvana: Death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

<sup>11</sup> Kim Hunter Gordon, *Breaking God's Flail: Chan Sculpture and the Death of a Great Khan in Song Dynasty Hechuan*, Beijing: Zhongguo yuanzineng chubanshe 中國原子能出版社 (China Atomic Energy Press), 2012.

<sup>12</sup> Karil J. Kucera, *Ritual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Visualizing Enlightenment at Baodingshan from the 12th to 21st Centuries*,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6.

<sup>13</sup> Xiao Yang, *Local Monuments, Local Narrativ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Rock Carvings in Northern Sichuan, 618-907 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Ruprecht-Karls-University Heidelberg, 2021.

<sup>14</sup> Henrik H. Sørensen, "A Study of the 'Ox-Herding Theme' as Sculptures at Mt. Baoding in Dazu County, Sichuan," *Artibus Asiae* 3/4 (1991): 207-233; Henrik H.Sørensen, "The Didactic Use of Animal Images in Southern Song Buddhism: The Case of Mount Baoding in Dazu, Sichuan", *The Zoomorphic Imagination in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edited by Jerome Silbergeld and Eugene Y. Wang, 137-17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sup>15</sup> Stephen F. Teiser, "The Local and the Canonical: Pictures of the Wheel of Rebirth in Gansu and Sichuan," *Asia Major*, 2004 (1): 73-122.

*Visual Culture*), 由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發行。在這本書中, 李琛妍也研究了四川安岳臥佛院的唐代涅槃變雕刻。李琛妍現為美國南加州大學 (USC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ornsife 文理學院 (College of Letters, Arts and Sciences) 的美術史、東亞語言、文化與宗教系副教授。

《懸崖上的寺院——四川佛教藝術》一書的寫作起自作者從 2002 年開始對川渝部分石窟的考察。該書的前言 (Introduction) 介紹了一些開鑿石窟的歷史, 使讀者瞭解一些石窟的基本常識, 還介紹了四川與重慶地區的石窟概況。本書的主要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題為“裡面與外面”, 共有兩章。第一章題為“樂山大佛, 水的鎮定者”。第二章題為“寶頂山的自我犧牲與救治”。可以看出, 作者在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了兩個點地: 四川的樂山大佛和重慶的大足寶頂山, 重點探討了自然環境在古代川渝建立石窟設計方面的角色。作者認為, 樂山大佛和大足寶頂山的佛教造像, 都是人們有意抵制自然災害和疾病的行為, 都是通過改造某一具體的地點去吸引佛的神性的幫助。作者指出: 樂山大佛被認為是一項控制水的工程, 使有潛在危險的三江匯合處得以平靜。李琛妍還認為, 寶頂山是一個多位置治療中心, 依賴的是有詳細說明的圖像安排, 基於地方上的傳教者柳本尊為其追隨者所實施的儀式活動。她認為, 儘管樂山和寶頂山雕鑿的背景不同, 這兩個地點揭示了石窟設計的核心方面, 即內部或外部受空間條件限制的互相作用, 並由此產生了獨特的豐碑式的組雕。同時, 樂山大佛和寶頂山也有著明顯差異: 樂山大佛使石窟開鑿著當地山水, 是樂山大佛的土地轉換技術; 寶頂山則通過雕刻圖像來展現宗教團體。二者都體現了佛教藝術對古代四川氛圍和環境的十分具體的反應。總之, 第一部分主要談石窟與自然的關係。



認為樂山大佛有鎮壓三江匯合處的功能，也是很多中國學者的共識，並非作者的新意，但作者無疑加深了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將寶頂山的雕刻圖像理解為柳本尊教派的儀式活動，這種觀點在中國學術界也有一定的市場。有的中國學者還直接認為寶頂山就是柳本尊教派所設立的密教道場<sup>16</sup>。筆者認為，寶頂山大佛灣造像的開鑿，雖然與柳本尊教派的傳人——南宋趙智鳳有關，但其具體內容並非局限於密教，特別是柳本尊教派，而是表現著多樣性。其中有表現佛教一般道理的九龍浴太子、六道輪回圖、地獄變、涅槃變、十二圓覺菩薩、舍利寶塔等，有華嚴宗推崇的華嚴三聖像和“七處九會”造像，有淨土宗信仰的“西方三聖”像與“九品往生”圖，禪宗創作的“牧牛圖”，還有宣揚傳統孝道的“報父母恩重經變”和“大方便佛報恩經變”等。很多圖像都附有詳細的題記，便於人們瞻仰與閱讀學習，從而領悟佛教道理。所以，不如將寶頂山大佛灣理解為一個普及佛教基本常識與教義的教育基地更為妥當，目的是為了教化眾生信仰佛教。

李琛妍書的第二部分題為“使用者與持續性”，共有三章（即第三、四、五章）。第三章題為“大足石窟的管理者、土地、社區”，第四章題為“南龕的訪問者”，第五章題為“大足石刻的修補者”。第二部分闡述了大足與巴中南龕這兩個地點對後代使用者的影響，特別是在現代當石窟變成了文化遺產和旅遊者的目標時。她認為，人對這些石窟使用功能的變化是複雜的，是三個有關係的主要群體（石窟管理者、參觀者、修補者）不斷約會的結果。每一個群體的行動與思考都體

---

<sup>16</sup> 郭相穎《寶頂山摩岩造像是完備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場》，《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4期，第62-66頁；郭相穎《再談寶頂山摩岩造像是密宗道場及研究斷想》，《佛學研究》1996年第5期，第278-287頁。

現著不同的持續性觀念，在當代中國展示著在不同的外觀之下隨著時間持續演化。對石窟地點的管理者來說，維持寺院田地的生產率是致關重要的，因為要確保僧侶們的生活，還要確保石窟地點在未來的生存。大足有著長期的官方參與管理石窟的歷史，寶頂山和北山提供了兩個豐富的調查與研究案例。對訪問者來說，四川巴中南龕造像有著近千年的豐富的供養人題記，表明有著虔誠信仰的在家信徒在早期的數百年里主導著這個地點，但以後被為著其他目的來訪的大量信徒所取代。在南龕現存的内容中，展示著許多訪問者對這個地點作為歷史豐碑的評價，而不是把南龕當作一個宗教中心。對於石刻的修補者來說，他們對這些佛教造像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不論其工作是修補大型石雕表面的鍍金，還是重建石窟前部的保護性木檐，他們持久的職業水準維持著石窟的存在。他們在 21 世紀初對寶頂山大佛灣千手觀音像的修復即為例證。還有在幾百年前在造像龕前建立木構檐閣以保護龕像，則是前人對石窟造像的維修。總之，第二部分主要談石窟與人的關係，特別是石窟建成後與後人的關係，是中國石窟研究者不常涉及的話題，為學術界研究中國石窟帶來了新思路。

此外，在當代中國還有新開鑿石窟的地點，開鑿者們仍然使用著古代傳統的方法在山崖間雕鑿窟像。有意思的是，李琛妍注意到他們慎重地規避著對石窟開鑿技術的革新，這與現代科技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應用與革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總而言之，兩個基本問題構成了此書調查的範圍：自然環境以何種方式形成了石窟的設計？石窟地點又是怎麼樣改變著它們的利益相關者的合作，與後者將其作為環境一部分的理解。這兩點都是中國學者考慮較少的問題。作者還提出了如何以石窟為縮影來理解四川

佛教藝術在生態學上的重要性。這些無疑都是對川渝石窟研究領域的貢獻。李琛妍還認為，比較其它地區的石窟，四川石窟對地上的物質遺產表現出了更多的敏感性，以及對早年居民文化方面的適應性。其實，每個地區的石窟都會或多或少具有一些獨特風格，都應該是外來的石窟文化對本地居民文化的適應性。這個方面應具有普遍性，並非四川石窟的特性。

另外，這本書題為《懸崖上的寺院——四川佛教藝術》，容易讓人理解為是一本全面論述四川地區石窟與摩崖造像的專著。然而，此書論述的僅是樂山大佛、大足寶頂山石窟、巴中南龕石窟三個地點，顯然無法涵蓋整個川渝地區。還有，在作者完成此書時，重慶已從四川分出，且書中討論的重慶大足石窟是一重點。因此，將書名改為《川渝佛教藝術》更好些，雖然作者在一個小注中說明瞭目前四川與重慶的關係，也說明瞭她所謂的四川實際上包括了重慶。當然，現有書名對在海外傳播此書有好處，因為外國人對四川(Sichuan)知者很多，因為它的辣味食品聞名世界，而不知重慶(Chongqing)為何。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最好在書名中標明研究的範圍，即加上“以樂山、寶頂為中心”等類似的語言為好。總之，書中討論的樂山、巴中、寶頂石窟開鑿時代不同，差異很大，且作者也沒有充分論述為何要以這三個地點來代表整個川渝石窟。對三地之間關係的彌補，以及真要概觀整個川渝石窟，還需要對更多川渝地點進行補充研究。